

高等教育学养丛书



史学名篇

□ 胡 戟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学养丛书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史学名篇

□ 胡 戟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ZZ5N03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名篇/胡戟主编.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0
(高等教育学养丛书)

ISBN 7—5613—3258—0

I. 史… II. 胡… III. 史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4282 号

责任编辑 侯海英
责任校对 常起辉
封面设计 徐 明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邮政编码: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h.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潼关县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0.5
插 页 2
字 数 648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数 1—4000 册
定 价 60.00 元

开户行:光大银行西安电子城支行 账 号:0303080—00304001602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销售部联系、调换。

电 话:(029) 85251046(传真) 85233753 85307864

E-mail:if-centre@snuph.com

出版者言

高等教育的职责是什么？是培养人才。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人才呢？我们以为：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应该具备深厚人文素养和较强专业学养。而我们的高等教育恰恰长期缺失这两点。如果说，人文素养的缺失是结构性的，那么专业学养的缺失就应该是理念性的。高等教育长期关注专业知识的传授，对有利于人才未来发展的更为关键的学术修养，关注较少。我们希望高等教育培养出具有学术思想的学者，而非仅仅知道某类知识的匠人。因此，我们希望能通过一些图书的出版来弥补这一不足。

由于长期从事高校教材的出版工作，我们感觉到，传统的大学教材大多都使用章节体结构，虽有利于知识的归纳和衔接，但是千书一面，很难看出学术个性和研究方法。而提升大学生学术修养的核心在于提升学生的学术见解和学术创新能力。经过广泛征询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我们觉得选编各专业经典的论文作为大学生的专业阅读读本，不失为一种好的提高大学生学术修养的方法之一。因此，我们希望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各学科专家对本学科的经典论文进行挑选，选择大多数专家认同的、代表本学科特点、引导本学科发展的数十篇论文，合编成集，每篇由专家在文后作导读，说明选文原因、本文特点、在学科中的地位。使学生通过阅读本学科经典论文，一方面了解本学科的核心观点，学派渊源；同时，学会如何撰写学科论文、进行专业研究，使学生真正达到专业成长。

基于这一思想，我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选择选编者，遴选有价值的经典论文。难度之大，出乎我们的意料。首先，当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每个学科都日新月异地发展着，各种论说、理论充斥，要挑选几十篇论文来代表一个学科的精华，很不容易。其次，现在学术分科极其细化，每个大学科都

被分割成一个个的分支,学者们大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钻研,而我们需要选择的是针对整个大学科的有普适性的经典论文,而且哪些算是有普适性的经典论文,学者们意见不一。第三,要完成这一工作,选编者必须具备精深的专业功底,能把握全学科的发展脉络,同时,又要立足高远,高屋建瓴,在浩繁的专业论文中挑选出真正有价值的、对学生有帮助的经典论文。要让所有的思虑一一迎刃而解,并且与我们的出版初衷完美的结合,难度是可想而知。

幸好,我们遇到了一个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的时代;幸好,我们遇到了一个重视提升高等教育教学水平的时机;更为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一大群精通专业又倾情高等教育的专家学者,有了他们的辛勤劳动和通力合作,才有了我们这套《高等教育学养》丛书的出版。

我们期望通过此套图书的出版,能够指导大学生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专业阅读,企图对目前我国大学的专业教育形成一定的冲击,从而,提高大学生的专业学养,使他们成为真正具备专业特点的新一代人才。同时,这套图书也可作为对某一专业有兴趣的读者的专业入门书,为其进入学术殿堂搭一把天梯。

由于《高等教育学养》丛书所包含的专业众多,篇幅浩繁,我们将按计划分批分册出版。本丛书各个分册在选编工作中肯定存在着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10月

序 言

■ 宁 可

胡戟同志编的《史学名篇》一书脱稿,嘱我写一篇序。我自来怵于写序作跋,但终究教了四十几年的史学理论课,忆起一些有关讲授这门课的往事,往往不能自己,因此写下这篇短文。

那是上世纪50年代末,正值大跃进的年代,八方点火,四面开花,令人激动,也令人感奋。1960年,开始兴起了“教育革命”,随之而起的是“史学革命”。高校历史系学生纷纷投笔而起,打起背包,下乡下厂,去编写村史、厂史、社史、家史,还有被誉为“子教三娘”的学生自编的新的教材。“史学革命”提出了革命要求,那就是在教学中要求打破王朝体系,以农民战争划分历史阶段,每个时期都要以农民战争打头,还有“以论带史”。在这股浪潮冲击下,各个高等学校历史系纷纷开设“历史科学概论”这门课。然而史学革命其来也骤,其去也速,大概是一些老同志有意见提出来要纠偏和学生们干不下去了吧。不到一年,一切几乎恢复旧观,史学概论也悄然停开了。问起来,只说这门课与高校四门政治理论必修课里的哲学课历史唯物主义部分重复了,不好讲。

北京师范学院(现在首都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也随风而起,开了这门课。当时认为要有点自己的特色,保留了一些史学方面的热点话题,有争议的东西,像历史分期、农民战争等。在那个万马奔腾、三天一小变、五天一大变的年代,历史科学概论仍然坚持了下去。不过也有点“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寂寞之感了。

转眼到了1962年春天,中宣部和高教部联合成立了高校文科教材办公室。从高校调集了一百多人,借了中央党校一栋宿舍楼,摆脱大跃进的喧嚣,大家坐下来,安静地编起各种

文科教材来。

当时,确定《历史科学概论》教材的主编是从中央政治研究室新调来的《历史研究》杂志主编、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同志。

黎澍同志在各方推荐下,1962年夏天从高校借调了三个年轻教师来编书,即吉林大学历史系的李时岳、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胡绳武和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宁可。

那时,黎澍同志刚到五十,精力充沛,谈吐风趣。我们三个背后都以“主编”称之。当时商定,每个星期去他家见一次,请求指教,并商量一些问题。同时,从近代史研究所借来一批书,记得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四部丛刊初编,还有普列汉诺夫、黑格尔等等,摆了五六个书架。外边有一个研究所传言,三个人借了一屋子书,在那里乱翻。那是在预期编书不会成功吧。怕是有一点嫉妒而又幸灾乐祸的心理在的。

那时黎澍编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已于1961年出版了,第一次印了几万册,这个数字现在很少见,那时却是司空见惯。高校历史系师生几乎人手一册,我们即以此为主臬,依照该书为骨架,编出了一个编写提纲。黎澍一看看不满意,认为那是摘录而不是著作,亲自在一张卡片上写了一个简单的提纲,计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历史研究之成为科学,胡绳武执笔;第二部分,历史和历史科学,由我执笔;第三部分,历史研究方法,李时岳执笔;第四部分总论性质,黎澍同志准备亲自动手。

我们安心读书,每星期三下午去黎澍同志那里一次。开始,主编还给一些指点,或给一两张卡片,以后就变成聊天了。黎澍同志很关心史学界的动向,每次去他那里总问“有什么消息”。他很少臧否人物,但偶尔提到一些人和文章,他常说的话是:“这个人(或某篇文章)有思想”或“没有思想”、“他对这个问题是做了研究(或没有研究)的”,给人的印象是他的规格很高。这两句话后来就成了我们的口头禅。

从1963年到1964年,编书的进展很缓慢,遇到很多困难,我们曾对此向黎澍同志做过汇报,担心书编不出来。他只是说:“编不出也罢,有时间读点书也是好的。”

1964年春夏之交,几经努力,李时岳、胡绳武的稿子都写出来了,我的也交了两个题目,黎澍同志看了,不置可否。我们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下边私议:“主编大概规格太高了,我们的恐怕都不行吧。”但究竟是没有思想还是缺乏研究呢,谁也不清楚。

1964年初夏,云南大学的谢本书给了黎澍同志一封信,请求参加工作。黎澍同志把他也借调过来。他并没有参加历史科学概论的编写,只是一篇又一篇地写文章送到黎澍同志那里。夏去秋来,中苏公开交恶,黎澍同志受命组织写批判苏修和有关中俄关系和边界问题的文章。于是宣布“历史科学概论”工作停止,李时岳和胡绳武回原校,我则一度被调到他主持的“现代史讨论会”参加写批判(前)苏联修正主义的文章。借的书也归还了近代史研究所,其中大部分像四部丛刊初编翻也没有翻过。

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历史科学概论”课仍在开着,一度改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毛泽东同志的“七三”批示引起学校很大震动,随后组织人去“四清”,并且根据北京市委指示在学校历史系试点,总结工作,听取意见,叫做搞“不叫四清的四清”。历史系的正常工作几乎停顿了,随后全系师生又一起到十三陵去开门办学。历史科学概论虽然还列在教学计划之内,大家已经没有什么心思和精力摆弄这门课了。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像一场洪水,把一切都冲的片瓦无存,上课更是谈不上。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十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再次恢复高考,忽如一夜春风来,历史科学概论就像花朵一样开遍了高校历史系的田野,各种教材、专著纷纷出版,几乎有二十种。北京师范学院的“历史科学概论”不仅成了历史系本科生的必修课,也成了研究生的必修课,由我来上,改名为“史学理论研讨”,逐渐形成了六个专题,每年上一个学期,选择其中的一两个专题轮流来讲,讲得比较多的是导论、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本体论。历史价值论讲过两次,不太成功,史学工作者的素养讲过一次,史学方法论另有课程,我这里没有讲过。这期间,还应出版社之约与汪征鲁同志合写了一部《史学理论方法》。

细算起来,文革以后,这门课程已开了二十多年,我在开课过程中只想到三点:

第一,不要离开历史。宁愿把它讲成一些史学研究的例证,而不要讲成像抽象干燥的条条,应当让材料与观点相结合,让学生对历史有兴趣,形成一种“历史感”。我上这门课时感到对学生还有一点吸引力,但恐怕他们有印象的大概是一堆史学趣闻和历史故事吧。

第二,不必严守章法。我好读书,但泛而且杂,不求甚解,汗漫无所依归。有关史学理论的书却读得很少,实在没有成

目 录

序言	宁 可(1)
中国历史研究法(存目)	梁启超(1)
历史学家的技艺	马克·布洛赫(4)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费尔南·布罗代尔(15)
历史如同知识	伊雷尔·马鲁(32)
前不见古人——谈中国历史人物的塑型	逯耀东(48)
一个值得努力研究的重大史学课题——人类历史 上的社会发展效益问题	胡如雷(55)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道格拉斯·C·诺斯(64)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竺可桢(78)
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 局面	谭其骧(105)
战国后中国内战的统计和治乱的周期	李四光(126)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顾颉刚(134)
夷夏东西说	傅斯年(185)
内蒙访古	翦伯赞(216)
替曹操翻案	郭沫若(227)
释“王与马共天下”	田余庆(240)
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	唐长孺(261)
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	桑原鹭藏(288)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陈寅恪(298)
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	张广达(318)
论唐太宗	汪 篪(334)

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	邓广铭(362)
论海瑞	吴 晗(369)
气候变化与明清代兴	汪荣祖(383)
中西接触与文化更新	钱 穆(390)
治史经验谈	严耕望(404)
附录:	
苏东坡突围	余秋雨(464)
万历皇帝	黄仁宇(474)
后记	胡 戟(477)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存目)

本文选自《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1 月出版。

目 录

自 序

第一章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第二章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第三章 史之改造

第四章 说史料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

[导读]

梁启超(1873—1929年)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人。他生性聪慧,12岁成秀才,17岁中举,人称“神童”,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1895年春,师徒一起赴京参加会试。1895年到1898年,他积极协助康有为推动维新变法,参与“公车上书”,加入强学会,主持《中外纪闻》和《时务报》,尤其是他以二十几岁年龄主持《时务报》,并发表了《变法通议》等大量优秀论文,使人刮目相看,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与康有为合称“康梁”。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此后,随着对西方、中国认识的不断深入,思想也逐渐由立宪保皇向民主共和转化。虽然他主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宣扬改良、反对革命,但同时又和革命党人往来密切,一度有合作建党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式,他很快从主张“虚君共和”变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加入袁世凯政府任司法总长。后他又坚决反对袁世凯、张勋复辟,发表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并与弟子蔡锷共同谋划了护国运动,起草了讨张宣言。随后他在段祺瑞政府中任财政总长和盐务总署督办,段倒台后,他也辞职旅欧,1920年回国后潜心于学术直至病逝。此间,由于他思想的变化,与康有为的分歧越来越大。梁启超因不满其师坚持保皇立宪,曾要求其退休。张勋复辟时,双方终于决裂,康是复辟力量的核心,而梁则公开反对复辟。梁说康是“大言不惭之书生,与时局甘苦,毫无所知”,康则将梁比做专食父母的泉镜。后经人调解,双方关系有所缓和。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时,梁启超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衷心感念师恩并将之比作孔子,深得康氏欢心。同年康有为逝世,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京设灵公祭,为二人间的恩怨划上了一个较为完满的句号。

梁启超不仅是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位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均有涉猎;早年曾倡导“诗界革命”,进行文学改良活动;发动“史学革命”,批判旧史学,宣扬西方近代史学;考察美国经济时又写下《财政原论》一书,成为近代中国财政学的开拓者。1920年旅欧回国后,因对政治已厌倦,更是全力投入教育与学术;受聘于南开大学,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京师图书馆与北京图书馆馆长,并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讲,其间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论著,在教育与中国历史文化方面做出了非凡成就。据此有人称之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巨人”,但也有人认为他兴趣太广,导致研究多流于肤浅。

梁启超著作结集极多,据李国俊先生统计,各种《汇编》、《全集》、《文集》、《文选》、《文存》等有40种,而且还不齐全,其中《饮冰室合集》就有一千余万字。后人评价他“名成于政治,功成于教育与学术,而学术则成于饮冰室书斋内”,可谓对其一生准确的写照。

《中国历史研究法》原是梁启超于1921年秋在南开大学所作的讲演,部分曾发表在当年《改造》11月、12月第四卷第3—4号上,次年1月又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后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这是他二十年来治史经验的总结,形成了自己新的史学理论体系,在学术界反响极大,主要内容是:

一、在第一、二章里重新阐述历史的目的和意义。他认为历史的目的和意义在于:

1. 人类社会是以有限的个人活动相继组成无限,是“螺旋形的向上发展”的,史书就是叙述历代人相继即“赓续”活动的情况,应为“现代一般人活动”,而不应像过去一样只为权力阶级、知识阶级提供借鉴。

2. 史书应为今天而做,应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替死人本位的历史,探讨人类社会整体而非个人的发展状况以求得其因果规律。

3. 探寻和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中华民族的内容,以说明其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来激发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奋发图强。

二、在第二、三章里对旧史学进行批判,同时提出了建设新史学的具体构想:

1. 重新划定史学的研究范围。他认为过去的史学只重帝王将相而不重民众与社会,只重政治而不重经济、文化;只重社会上层活动而不重普通社会。新史要将这些内容吸收进来,各自然科学等专业性极强的专门学科应被排出,在专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以史学为总枢来驾驭各学科,实质上是借鉴西方近代的学科分类法来建立新史学体系。

2. 史书应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他指出旧史书只重事例而不重时空的相互联系,前后事实孤立,支离破碎,“事实之叙录与考证不过以树史之躯干,而非能尽史之神理。”他认为史书应有一主线贯穿,能说明社会发展的轨迹。他最欣赏的史书体裁是纪事本末体:“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

3. 史学应客观地反映历史。他指出所谓的“明道”“经世”必导致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近代以来,学术与政治相连成为时尚,但有时难免牵强附会。他强调要对历史作“纯客观”的研究,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之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实际上,历史与现实在此并未被分开,因为只有客观的历史,才能为现实社会提供真正有意义的借鉴功能。

三、在第四、五、六章里介绍了如何用新方法认识与整理史料、史事:

1. 他用大量篇幅介绍西方的归纳法,以自身的研究做例子,大大增强了说服力。

2. 他主张将国家藏书效仿西方图书馆、博物馆的方式向世人开放,为史书写作创造有利的条件。

3. 他提出了探求因果关系的具体方法:先确定一个“史迹集团”为研究范围,注意集团内外各相关因素、核心人物“人格者”的心理活动,再研究当时的物质条件,度量心与物的最大可能性,寻找事件的起因。

1933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梁启超1926至1927年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讲稿,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99,实际是旧作的补充,主要讲专门史的作法,尤其是史学史部分最详,实际已写出了《中国史学史》的提纲,后来金毓黻等人的史学史著作多受其影响。

他的成功还在于生动传神的讲演,独具魅力的语体白话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他的讲演、文章确实对青年人具有启发、引导的作用。

当然,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仍有局限性。一是英雄史观,认为核心人物、英雄人物决定了历史;二是历史观的倒退倾向,《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书不久,他又发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否定了原来坚持的进化论、因果律、归纳法;三是史学体系的脆弱,史学体系缺乏一种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他重视历史哲学,但只能走到进化论这里,对西方的思辨哲学却缺乏把握。

梁启超的局限是时代造成的:国家与民族的苦难使得他在接受新思想时都把目光首先投到救国救民上来。他强调英雄的作用,无非是希望中国出现一位卓越的领导人来引导中国走向独立富强;强调进化论也是要增加人们的民族危机感,鼓舞士气;而思想的退化正是一次次失败后产生的痛苦。可以说,这种缺陷是难免的,反而透露了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因而,缺陷并无损于其魅力,他的史学理论在今天仍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朱文广)

[法]马克·布洛赫

历史学家的技艺

本文选自《历史学家的技艺》，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2。

第一章 历史、人、时间

1. 历史学家的选择

“历史”是个十分古老的名词，有时使人们感到厌烦。当然，人们还不至于想把这个词从词汇中全删除，即使是涂尔干学派的社会学家也为“历史”留下一席之地。不过，要知道，他们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将历史放逐到人类科学中的一个可怜的角落里。尽管社会学家认为任何事物都可接受理性的分析，他们却把所有被其视为最肤浅和变幻莫测的人类事实，封存在那个隐蔽的地牢里。

与此相反，在这里我们要从最广泛的意义来阐述“历史”一词。在人们研究探索的道路上，这个词并没有预先设置什么禁忌。它可以指转瞬即逝的震荡，也可以指旷日持久的演变。它本身并不包含教条。它最初的含义，无非就是指“探索”罢了。自然，从两千多年前人们第一次说到这个词以来，“历史”的内涵已有极大的变化，一切有生命的词汇无不如此。如果科学每前进一步都得造些新名词的话，那么待命名的东西真要成千上万了，学术界得为此虚耗多少光阴啊！

“历史”一词产生于辉煌的希腊化时代，并沿用至今，我们现在的所谓“历史”已远非米利都城赫卡泰厄斯的“历史”，正如开尔文勋爵和朗之万的“物理学”已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一样。那么，我们所谓的“历史”究竟是什么呢？

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真正”的问题时，在一开始就去下乏味而僵硬的定义将是毫无意义的。地道的工匠怎会拿这些有关信念的条文来自寻烦恼呢？在追求尚未确定而有发展前途的知识时，人们会产生一种朦胧的冲动，而烦琐细微的定义却会扼杀这种创造性智慧的火花。谨小慎微的定义所带来的最大危险，仅仅是导致进一步的限定。迪

万·莱克希考格夫曾言：“这个课题或探讨这个课题的方法无疑是诱人的。但是，当心点！莘莘学子，这并不是历史学。”难道我们就像古代行会那样，把任务按规定项目派给同行的成员，并永远照章办事，干脆将活儿留给老师傅来干吗？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就比较明智，他们从来不去为物理或化学、物理化学或化学物理（假设这个词）的权利而争辩不休。

确实，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历史学家必须开辟出一块供他耕耘的特殊领地。显然，他必须作出选择，这种选择不同于生物学家，但那必须是历史学家的适当选择，因此，就产生了一个真正的行为问题，这个问题将始终伴随着我们的研究。

2. 历史与人类

人们有时说，历史是一门有关过去的科学，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很不当。

首先，把“过去”这个概念作为科学的对象是荒唐可笑的。没经过事先筛选的，不具备与我们当代完全不同的某种过去共有特征，我们又怎能使现象成为有条有理的知识呢？根据一枚奖章的反面，人们又怎能想象出一门天衣无缝的宇宙科学现状呢？

无疑，在历史编纂学的初始阶段，古老的编年史家是不会对这些琐屑的问题感到困惑的，他们叙述一些杂乱无章的事件，其中仅有的联系，就是这些事件是同时发生的，如日食、冰雹，以及突然出现的惊人的流星，同时发生的战争及国王和英雄的去世。这些有关人类早期记忆，犹如幼童观察事物时那么零乱，然而，这种为进行分析所作的不懈的努力，已渐渐导致了分类。不错，从基本保守的观点来看，在我们的语言里，任何关于现象在时间上的变化的学问都可为历史。这样的惯例有利无弊，人们不会因此而困惑不解。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现在所见的由行星组成的太阳系并非永恒不变的，也就有了太阳系的历史，它涉及地球的构成，因此能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但它与历史学所谓的历史无关。

至少，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过去观察到的现象与人类历史上一些特殊事件正好巧合。那么，在实践中，他们又是怎样分析的呢？要搞清楚这一点，一个简单的事例抵得上千言万语的论证。

公元10世纪，水深浪大的文斯湾使佛来明斯成为锯齿形的海岸。后来，海湾被沙石堵塞了。应该由哪门科学来研究这个现象呢？初看起来，谁都会说应归地质学，冲积层的沉淀运动、海流运动，或海平面的变化，不正是地质学所发现研究的范围呢？当然是的，但进一步看，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第一个问题是要调查地质变迁的起源，接着，地质学家就要被迫回答一些严格说来不属于其专业范围的问题了。无疑，至少还有人工围堤促使海湾淤积、改变河道的流向以及灌溉系统等因素，所有这些人类的活动均基于人们的集体需求，并依靠一定的社会组织来进行的。在锁链的另一端还有一个新问题——后果。离海湾尽头不远处，有一条小河通往一个小镇布鲁吉，借助文斯湾的海水，每天有大量的商品在这里进出，相对而言，它的地位在当时相当于今天的伦敦或纽约。后来，沙石日甚一日地涌来，海水渐渐消退，文斯湾的码头延伸到了河口，这个港口就逐渐消失了。要知道，这并非是港口衰亡的唯一原因，但无疑它是因果链中极为举足轻重的一环（除非物质运动是由其他人为因素来安排、促成和规范的，否则它又怎能影响人类社会呢？）。

一个社会按照自身的需求来重新改造人们栖身的大地，任何人都本能地承认，这是

一次“历史性”的事件。一个重大的贸易地位的盛衰也同样如此。从以上这个地质学典型事例中,我们看到:一方面呈交叉状态,要作出解释,两门科学便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呈转变状态,当我们以结果尚未确定的唯一例外来描述一种现象时,它会以某种确定的唯一方式,以一门学科来取代另一门学科。究竟是什么支配了历史的介入呢?显然是人为因素。

很久以前,我们伟大的先辈密芝勒或浮士蒂尔·古朗治和曾经教导我们: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还是让我们把它称为“人类”吧。复数比单数更便于抽象,相对而言,复数的语法形态更适用于一门研究变化的科学。地形特征、工具和机器、似乎是最正式的文献、似乎是与缔造者完全脱离的制度,而在所有这些东西背后的是人类。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

作为人类知识的历史学的性质,在问题的表述方面还有其特殊的情况。它是“科学”还是“艺术”呢?大约在1802年左右,我们的老前辈曾乐于就这个问题进行严肃的辩论。后来,大约在1890年,人们对早期实证主义的说教感到腻烦,方法论者为公众对他们所谓的历史著作的“形式”过分的重视而感到恼怒。艺术之于科学,形式之于实质等等,史学界居然充斥着如此琐细的争论。

巧妙的均衡所具有的美感并不亚于一句美妙的措辞,但每一门科学都有与之相应的语言美。实质上,人类的行为极为微妙,在许多方面难以作出数学式的评估,必须将它转化为语词,也就是说要正确无误地衡量人类的行为(谁能够完全认识自己不知如何表述的事物呢?),必须有极为精致的语言,遣词造句更要铢两悉称,计算行不通的地方,我们不得不运用联想。表述自然界的语言与反映人类现实的语言之间是有差异的,这类类似于操作钻床的工人和制造鲁特琴的匠人之间的差别,两者的工作都精确到以毫米为单位,但钻工使用精密的工具,匠人则主要凭他的听觉和触觉。假如钻工效法工匠的经验和方法,或者工匠模仿钻工的做法,都将是不明智的。一个人不能既用数字又用语词来感知事物,对此,谁又能加以否认呢?

3. 历史的时间

我们已把历史学称为“人类的科学”,那还是太含糊了,有必要加上“时间中的”定语。史学家并非抽象地思索人类,在他们的思想中总是自然而然地注入时代的气息。要知道,很难想象任何一门科学把时间看作一种计量单位,他们为了各自的目的,任意将时间分割成性质相同的碎片。与此相反,历史的时间却是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现实,它一往直前,不可逆转。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如果说放射性物质转化成其他物质需要“几秒”、“几年”或“几世纪”的时间,那这些数字只能是原子物理学家的基本数据。这些变态中任何一个特殊的现象,无论是发生在几千年前,发生在昨天或今天,或注定要在明天发生,无疑都会使地质学家感兴趣,因为地质学是注重历史变迁的学问,物理学则对此毫不关心。凯撒花了八年的时间征服高卢,爱尔福特的路德从正统的见习修道士转变为维滕贝格的改革者经历了十五年的时间,但没有一个史学家会仅以讲述这些事实为满足。对史学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在欧

洲社会变迁的背景下确定征服高卢在编年史中的地位,史学家丝毫不否认马丁·路德的精神危机之类不变因素,但唯有将这场运动发生的确切时刻放在其主角的人生履历中,以及与作为背景的欧洲文明联系起来考察,他才认为自己绘制了一幅逼真的图画。这种真正的时间,实质上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就源于这两种属性的对立。这样,就引起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即我们研究的存在理由是什么?假设从不间断的时代顺序中抽出两个连续的阶段,时间之流在两者间的联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支配或没支配从这一时间长河中产生出来的差异呢?认识前一阶段,对于了解后一阶段是必不可少的,还是不必要的呢?

4. 起源的偶像

承认自己的欠缺是不会错的。站在遥远的过去来解释当前,这对以过去为研究主题的人极有吸引力,这种做法已使我们的研究处于催眠状态。抓住最为显著的特征,可将史学家部落的偶像称为“起源的迷惑”。而且,从史学思想的发展来看,起源崇拜有过备受青睐的时候。好像是勒南曾写道:“在所有人类事务中,起源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值得研究。”(引文来自记忆,恐怕不够正确。)在勒南之前,圣·贝弗也说过:“由于好奇,仔细研究了许多事物的‘起源’,并作了笔记。”这个观念在那时是十分典型的,“起源”一词也是如此。《基督教的起源》问世不久,又出版了《当代法兰西的起源》,更不要提模仿之作了。然而“起源”的含义是模糊的,因此也是令人困惑的。

“起源”仅仅意味着开始吗?这本来是相对清楚的,只是就许多历史事实而言,起点的概念简直令人难以捉摸。这无疑定义问题,然而不幸的是人们往往容易忘记定义。

另一方面,“起源”是否指原因呢?那样的话,探究原因固有的本质就没什么困难可言了。(在人文科学方面无疑更是如此。)

但是,两种含义时常互相混淆,更令人伤脑筋的是很难清晰地加以分辨。通俗的说法,起源就是开始,更糟的是认为“开始”就等于完满的解释。这样,便导致了词义的混乱,进而带来危害。

评注家对探隐索微、追根溯源尤其是着迷,可以对此作些很有趣的研究。巴雷斯对那些已失去信心的教士坦然相告:“你鼓吹的那一套我不懂”,“几位学究有关希伯来语的论述与我的感情又有什么相干?教堂的气氛就足够了。”用莫拉斯的话来说,“四个下贱犹太人的《福音书》和我有什么关系?”(照我看,“下贱”一词是指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出身平民,在遣词上至少带有一定的贬义。)这些恶作剧者是在取笑我们,无论是帕斯卡还得博绪埃,都不会如此大胆妄言。当然,撇开历史仍然可以对宗教有所体验。对纯粹的自然论者来说,只要内心信仰上帝就行了,但他不会信仰基督教的上帝。我已指出,基督教实质上是一种历史性的宗教,其原始教义是以事件为依据的。重温一下你的信条吧:“我信仰耶稣基督,……他被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又复活了。”这样,信仰的起点也就成了信仰的基础。

对起源的偏好,从某些宗教方面来分析尚情有可原,但这种倾向已经不可避免地蔓延到其他研究领域,那显然是不足为训的。追寻历史的起源甚至为价值的判断服务。泰恩阐述法兰西的起源,旨在谴责他所谓荒唐的人类哲学所导致的政治恶果!无论是德意志